贸议天下

金砖赋能，中资企业投资埃及提质升级

■ 洛紫恒



图为中埃经贸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一角。

图片来源：泰达合作区官方网络

2026年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70年来，两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从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合作层级持续跃升。2024年埃及正式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为中埃经贸合作和中国企业对埃及的投资开辟了新的制度空间。

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加速迈入机制化、务实化新阶段，政策、资金、区位与产业四重利好相互叠加，为产能合作打开了系统性的战略窗口。

一是双边与多边框架的协同效应日趋明显。2026年9月两国联合声明为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建设及工业、物流、清洁能源等领域的项目落地提供了坚实政治保障。与此同时，金砖平台在基建融资、本币结算和绿色转型等领域开辟了更为宽广的政策沟通渠道。两类机制有机联动，有效提升了从协议到动工的整体转化效率。

二是融资工具的多元化改善了项目资金结构。新开发银行等机构的长周期资金与埃及基建项目高度匹配，结构化融资设计有助于分散国别与期限风险。跨境本币结算的扩大应用降低了多次换汇带来的交易成本，而多边合规要求亦倒逼企业提升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能力，使大型项目融资的可获得性与可持续性明显增强。

三是区位与贸易安排的双重优势为制造业布局提供了有力支撑。埃及扼守苏伊士运河要冲，坐拥过亿人口的内需市场，天然适宜产能本地化。更为关键的是，其嵌入非洲大陆自贸区、东南非共同市场，并与欧盟等主要经济体签署有关税协定，使“埃及制造”有条件辐射周边区域。叠加我国自2026年5月起对埃全税目产品零关税政策，农产品、纺织品及矿石深加工等领域对华出口通道亦更为通畅。

四是产业升级与绿色转型形成方向共识。中埃产能合作正从单点突破走向体系化推进，具备向纵深拓展的坚实基础。具体而言，家电与轻纺具备先行出海条件；新能源产业链契合埃及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超42%的目标；磷矿等资源深加工则具备延链增值潜力；电动汽车、海水淡化、半导体等前沿领域适合分层推进，优先以示范项目积累经验。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企业在埃及的投资也面临多方面的挑战。

一是宏观金融脆弱性是当前最突出的系统性风险。埃镑持续贬值直接推高进口设备与中间品采购成本，侵蚀埃镑计价收入的折算价值，同时加剧外币债务偿付压力。高通胀与高利率环境下，原材料、人力、用能及属地融资成本全面上行，挤压项目利润空间。

二是营商环境的落差不容忽视。一方面，跨部门审批壁垒制约落地效率，投资、工业、税务、海关、劳工等多头管理导致规则解读与裁量尺度参差不齐。另一方面，“黄金许可证”制度虽提供绿色通道，但主要倾斜于国家级战略项目，企业仍需履行繁杂的行业准入与常态化监管义务。

三是资源配置层面的倾斜抑制民营企业效率。埃及国有主导机构在土地出让、基建配套及公共采购中占据优势，民营主体获取核心生产要素的公平性依然受限。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持续敦促埃方推进“竞争中立”改革，但监管透明度的实质性改善仍需时日。

四是用工与配套能力短板。埃及将外籍员工比例严格限制在10%以内，仅特定技术短缺情形下可放宽至20%，倒逼企业加速本地化招录，但埃及本地高技能与管理人才的断层显著，迫使企业投入极高的培训成本。

五是贸易失衡引发的政策审视日趋严格。2024年中埃双边贸易额约173.8亿美元，中国自埃进口仅约5.8亿美元，显著逆差促使埃方愈发倚重能实现进口替代与出口创汇的中资实体，而严重依赖散件组装且主攻内销的项目将直面更严峻的汇率冲击与政策排斥。

六是地缘动荡与外部规则交织叠加多重安全风险。一方面，红海危机曾使埃及2024年运河外汇收入锐减约60亿美元，航运梗阻推高物流成本。另一方面，面向欧美市场的产能布局还面临原产地规则、技术壁垒及制裁条款的严密约束，借用国际金融机构资金更须满足严苛的ESG与反腐败合规要求，倒逼企业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管控体系。

面对上述挑战，可以采取以下应对路径。

一是建立双边统筹与多边协同的分层推进机制。围绕制造业、新能源、数字基础设施、海水淡化及关键矿产等领域，将项目划分为投产运营、建设实施和前期储备三类，分别聚焦税收海关、土地配套与市场论证等差异化问题，实现精准施策。依托中埃政企座谈及埃方中国投资专班，构建企业问题收集、部门限时办理、进度跟踪与结果反馈的完整闭环，并将共性问题固化为公开透明的政策说明。双边层面集中疏通准入与属地经营障碍，金砖层面则推动开发融资、本币结算与成员国企业联合投资，避免政策议题停留在会议层面。

二是构建长期资金、本币结算与风险分担联动的融资体系。推动新开发银行埃及项目储备做实做细，加速已进入概念审批阶段的项目完成可行性评估与正式审批，并增加面向私人部门的贷款、担保与风险分担工具。清洁能源、电网、港口、水务及数字基础设施等大型项目可引入新开发银行中长期贷款、非洲进出口银行贸易融资、中国政策性金融及埃及本地银行商业贷款，由各方分别承担长期贷款、担保及本币服务，形成互补性资金结构。

三是以出口能力培育与当地供应链升级优化产业布局。优先支持家电、纺织服装、新能源设备、化工新材料及汽车零部件等基础较好领域，提升现有园区产业关联度与设备利用率。对电动汽车、造船、半导体及关键矿产等新兴方向，须先完成市场、能源、技术、环境与融资系统性评估，再选择条件成熟的项目开展试点示范。加快建设公共仓储、检测认证、职业培训、法律财税及供应商服务等园区公共服务平台，降低单个企业承担的固定成本。

四是以深度本地化与安全韧性夯实长期发展根基。企业应提前培养埃及工程师、技术工人及管理人员，构建中埃员工共同参与的生产、安全与质量管理体系，实现人才梯度替代。大型项目须定期披露就业、纳税、培训、环保及社区投入情况，以可核实成果赢得当地社会认同。针对人员撤离、物流改道、关键备件库存、数据备份及替代供应商等制定地区安全预案并动态更新。对高度依赖单一港口、航线或进口原料的项目，量化评估运输中断影响，通过多港口运输、适量安全库存、替代采购及运输保险分散损失。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

优化营商环境 助推外资固稳促优

■ 孟彤

当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因种种因素面临挑战，中国引进外资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和复杂的变化。在这种“百舸争流、不进则退”的国际招商引资博弈中，中国如何稳住外资基本盘，并推动外资结构向高质量方向优化，成为亟待破解的问题。

外资的“稳”与“优”，不仅关乎当下的就业、税收和进出口，更是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抓手，而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更是外资企业选择投资地的首要考量。因此，实现外资“固稳”与“促优”的双重目标，必须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核心抓手，来推进我国进一步高质量引进外资。

聚焦“固稳”，以法治化营商环境稳定外资预期。“固稳”，重在稳住外资企业的投资预期，稳住我国的外资存量。外资企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其在东道国市场投资中最看重的，不是短期的政策优惠，而是长期的制度稳定性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一国或一地区的法治化水平越高，越能得到各类市场经营主体的青睐，经济发展的活力与动力便越持久。需保持外资政策的连贯性与透明度，尤其涉及外资企业的重大政策调整，应给予合理的过渡期，避免政策导向转变过大而引起外资企业不满；在政策发布前要充分沟通，采取听证会、座谈会等形式听取外资企业意见，增强政策公开透明性；完善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建立外资企业诉求反映渠道，建立“外资企业圆桌会议”等机制，指定团队协调解决外资企业在融资、用工等政策方面的现实困难与问题。

聚焦“促优”，以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升引资质量。“促优”即高质量引进外资，其核心在于引导外资流向高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等新质生产力行业，以优化外商投资结构、提升外资水平。聚焦“促优”，需精准扩大市场准入与重点领域开放，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稳步扩大金融、医疗、教育、电信等服务业领域的对外开放；鼓励外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承担国家科技项目，支持外资参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外开放环境是连接国内外市场的桥梁，优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优效应。我国自贸试验区基本功能定位是集投资、贸易、金融和科技创新等领域开放与创新于一体的综合改革试验区，通过以制度创新打造适应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体制机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体系，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鉴于此，在我国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区域，探索在数据跨境流动、贸易便利化等方面的国际服务，优化外资企业高管、技术人员签证及工作许可审批流程，完善国际医疗、国际学校等生活配套服务，为外资企业提供便利舒适的投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可提升外资促优效应。

破除隐性壁垒，以市场化营商环境激发外资活力。营商环境的优化不仅要“明规则”，更要破除“暗门槛”。破除隐性准入壁垒，建立外资企业招投标投诉快速处理机制，确保外资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促进要素获取公平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外资企业信贷支持，支持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融资、发行债券；保障外资企业在土地、能源、数据等要素获取上的平等待遇，不因企业性质设置不合理门槛；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做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减少对外资企业正常经营的干扰。杜绝“趋利性执法”和“选择性执法”，推行包容审慎监管。

强化服务赋能，以数字化营商环境提升外资效能。利用数字技术赋能营商环境，是提升外资服务效能的“加速器”，也是实现利用外资“稳量提质”的核心竞争力。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其赋能、改造传统营商环境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我国政府近年来出台了系列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与文件，通过打造数字化营商环境来发挥数字公共服务能力、数字技术创新能力、数字市场潜力等利好优势，以有利的投资环境向国外投资者传递投资信息，进而吸引大量优质外资流入。可以通过对市场监管体系的数字化应用，为市场主体提供司法保障、提高法治服务效率；助力数字金融发展，通过降低信贷约束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外资交易效率和盈利空间。

中国大市场是世界的大机遇，面对激烈的全球引资竞争环境，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将法治化作为基石，将市场化作为动力，将国际化作为方向，我们不仅能“固稳”外资基本盘，更能在“促优”中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外部动能、注入持久动能。

（作者单位系河北大学经济学院）

跨越太平洋的“数智丝绸之路”

■ 孙海泳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的物理底座，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数字竞争力的核心标尺。在当前的全球数字基础设施竞赛中，拉丁美洲是一块备受瞩目的“新蓝海”。然而，拉美数字基础设施的滞后与数字经济的迫切需求之间，横亘着一道巨大的“数字鸿沟”。这也凸显了中拉在此领域的合作空间。

2026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巴等双边合作提质升级的关键之年，中拉论坛《共同行动计划（2025—2027）》的100多项合作项目正在逐项落地。在此形势下，拉美需要“新基建”，而中国拥有“新基建”的能力与经验，双方的供需匹配正在催生一条跨越太平洋的“数智丝绸之路”。

中拉数字基建合作的发展机遇

长期以来，拉美的算力和服务器产业链高度依赖美国云基础设施。西方科技企业依托近岸外包控制了拉美的数字基础设施命脉，这种模式引发了拉美国家对“数字主权被剥夺”的强烈担忧。为弥合本国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格局中的边缘化处境，拉美多国纷纷推出数字化转型战略。例如，智利政府已提出“2035数字转型战略”和“智慧产业战略”。自2018年以来，巴西政府每隔四年就发布一次数字化转型战略。此类数字转型战略显示拉美国家和地区致力于发展本国的数字经济，并试图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程。

中国在数字经济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成熟方案，正在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可复制、可负担的选择。中拉数字合作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设备出口阶段，进入了“能力共建”的新层次。2025年5月发布的《中国—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25—2027）》，明确提出在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强数字技术合作。2026年7月，中方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宣布将面向拉共体等全球南方地区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拉美国家也正在主动寻求多元化合作伙伴，以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这种战略自主性的提升，为中拉数字基建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拉数字基建合作的实践

在多个领域，中拉数字基建合作已经落到实处，促进互利共赢。

数字基建先行。数字基建是中拉数字合作的“先手棋”。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华为公司建设的云数据中心机房已投入运营，不仅为智利本地提供云服务，更吸引阿根廷、秘鲁等邻国客户接入。华为于2019年在智利投资1亿美元建立了首个数据中心，目前华为在智利已接连启动第二、第三个数据中心项目。中兴通讯则与西班牙电讯智利公司携手，在智利安托法加斯塔市推进5G转型。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凤凰工业园成为拉美首个5G网络全覆盖的智能化工业园。墨西哥则引入中国技术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推动了数字转型与社会包容。这些项目说明，中国企业在拉美数字基建领域已经不只是“参与者”，也日益成为“关键建设者”。

数智赋能产业。中拉数字合作正在从“建网络”走向“用网络”，将数字技术深度嵌入拉美的传统产业。巴西东南部的桑托斯港是拉美的重要航运枢纽，福建电子口岸股份有限公司在该港口启动“集卡防吊起系统”升级项目，有效提升了港区运行的安全性与效率。阿根廷的牧区引入中国卫星定位设备，让牛群跟踪和饲料管理更加科学。中国移动明确将智利定位为中国—拉美算力网络的核心节点。成立于2025年10月的中国移动国际智利公司已研发了面向智利及拉美市场的“1+8”行业数智化解决方案，包括“AI+智慧矿山”“AI+智慧园区”“AI+智慧港口”等重点行业解决方案。这些“中国方案”正在拉美的矿山、园区、港口落地生根。

数字红利惠民。数字基建的最终落脚点是民生改善。中拉数字合作的红利，正切实走进拉美民众的日常生活。墨西哥中部普埃布拉州的山区，当地果农通过参与“数字乡村”项目，借助数字营销、电子商务平台和物流系统拓宽销路，利润提高了20%。中国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合作的“数字千村”项目在智利试点，让偏远地区共享数字连接与农业信息化服务。跨境电商也成为连接中拉市场的重要“数字纽带”。一条跨越太平洋的“数字丝绸之路”从安第斯山脉延伸至加勒比海海岸，串联起拉美各国创新发展图景。

中拉数字基础设施合作面临的三重挑战

中拉数字基础设施合作面临三重挑战。地缘政治压力是最直接的外部挑战。美国对网络安全、数据隐私和技术自主权的担忧，给中国在拉美的具体项目带来了压力和障碍。随着中拉数字合作的深化，这种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拉美国家在中美博弈中如何保持平衡，将直接影响合作项目的推进节奏。

数字主权焦虑是拉美国家的内在关切。拉美长期依赖西方技术，对“数字主权被剥夺”有着深刻担忧。如何在引进中国技术与维护自身数字主权之间找到平衡点，是拉美国家必须面对的选择题。中国需要向拉美伙伴证明：合作不是“替代”而是“赋能”，不是“控制”而是“共建”。

本土能力短板是合作的深层制约。拉美地区整体数字基础设施滞后、数字治理能力薄弱、国民数字素养不足。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专业人才缺乏等问题普遍存在。此外，拉美国家还面临体制机制弊端、政策不连续性、标准差异等挑战。数字基建不只是“建”，更需要“管”和“用”，这需要本土能力的系统性提升。

中拉数字基建合作的优化前景

面对挑战，中拉数字基建合作需在涵盖项目合作到规则共建的四个层面持续发力。

第一，深化项目合作，打造标杆工程。从数据中心到5G网络，从智慧农业到智慧城市，需在已有项目基础上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让拉美国家看到“中国方案”不仅技术先进、成本可控，而且适配当地需求、尊重当地利益。

第二，加强能力建设，培养本土人才。进一步扩大面向拉美的数字技术培训、管理经验分享和政策规划咨询，帮助拉美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

第三，参与规则制定，提升话语权。数字时代的竞争不仅是技术竞争，也是规则竞争。数据跨境流动、人工智能治理、网络安全标准等议题正在成为国际治理的新前沿。中国应与拉美国家加强在数字治理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共同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数字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第四，平衡安全与发展，建立互信机制。进一步建立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和网络治理的双边与多边合作机制，为中拉数字合作筑牢“安全底座”。

中拉数字基建合作，不是简单的“中国输出、拉美接受”，而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数字化转型。中国有技术、有经验、有产能，拉美有市场、有需求、有资源。更重要的是，双方都有意愿在数字时代走出一条合作新路，并将成为全球南方国家携手跨越数字鸿沟的生动注脚。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拉美研究中心研究员、秘鲁太平洋大学中国与亚太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